

辛亥革命史丛刊

第五辑

《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编



中华书局

辛亥革命史丛刊

第五辑

《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

中华书局

1983年·北京

辛亥革命史丛刊

第五辑

《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16· 17¹/₂ 印张· 379千字

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5,400 册

统一书号：11018·1181 定价：1.65元

编 者 的 话

本刊是一个不定期的学术集刊，由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编辑，目的在于为辛亥革命史研究者提供一个交流研究成果和刊载历史资料的园地。

凡有关辛亥革命史的论文、考订、史料、图片、年谱、回忆录、译文、书评以及学术动态等，欢迎投稿。来稿字数多少不拘，如篇幅较长而又确有价值者，可以分辑连载，或作为《辛亥革命史研究丛书》出版。

来稿请写明真实姓名、详细地址、发表时的署名，邮寄“湖北武昌华中师范学院转《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由于本刊无专职工作人员，来稿务希缮写清楚，并认真核实引文，以免增加发稿和校对时的困难。

本刊尚属草创阶段，编辑工作缺乏经验，错误与缺点在所难免，希望广大作者和读者随时批评指正，并且不断给予大力支持。

《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

一九八〇年七月

目 录

论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潮 李喜所 (1)

辛亥革命时期的蔡元培 张寄谦 (23)

略论朱执信的经济建设思想 汤可可、尤学民 (42)

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问题初探 李荣昌 (55)

辛亥革命时期的梧州资产阶级 侯雅云 (67)

业余作者 来稿摘要 “滦州兵谏”与梁启超的关系质疑 周永华 (73)

《章太炎年谱长编》补 (1911—1912 年) 汤志钧 (76)

秋瑾史实辨正五题 郭延礼 (91)

关于公葬陈天华、姚宏业时间的订正 刘泱泱 (98)

周实二题 白 坚 (102)

有关“二次革命”的一份史料

——湖南都督府《三次电请通缉各犯罪状报告书》 (106)

“二次革命”湖南讨袁文告 (123)

闽南倒袁运动记 丘廑兢遗稿 (128)

宫崎民藏致中国国会议员书 (142)

四川保路运动前夜的社会状况 [日]西川正夫 邱远应译 (149)

革命日记 (连载之二) 《汉口日报》编辑 章开沅译 (188)

辛亥革命时期部分人物别名录 陈玉堂 (203)

CONTENTS

No. 5, 1983

Trends of Socialist Thought during the 1911 Revolution	Li Xisuo (1)
Cai Yuanpei in the Revolution of 1911.....	Zhang Jiqian (23)
A Brief Discussion of Zhu Zhixin's Thought on Economic Construction	Tang Keke You Xuemin (42)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Finances of the Nanjing Provisional Government	Li Rongchang (55)
The Bourgeoisie of Wuzhou during the 1911 Revolution	Hou Yayun (67)
(A Selection from Articles by Amateur Historians) A Quer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ang Qichao and "Luanzhou's Military Admonition"	Zhou Yonghua (73)
A Supplement to «The Chronicle of Zhang Taiyan» (1911—1912)	Tang Zhijun (76)
Five Corrections of Historical Facts Concerning Qiu Jin	Guo Yanli (91)
A Correction on the Date of the Public Burial of Chen Tianhua and Yao Hongye	Liu Yangyang (98)
Two Problems Concerning Zhou Shi	Bai Jian (102)
A Historical Document from the "Second Revolution"—«A Notification of the Crimes of Offenders Whose Arrests have been Requested Three Times by Telegram» from the Office of Hunan's Military Governor.....	(106)
Hunan's Proclamation Against Yuan Shikai during the "Second Revolution"	(123)
A Record of the Anti—Yuan Shikai Movement in South Fujian	Qiu Jinjing (128)
A Letter from Miyazaki Tamizo to China's National Assemblymen.....	(142)
The Social Situation on the Eve of the Railway Protection Movement in Sichuan	(Japan) Nishikawa Masao Translated by Qiu Yuanyin (149)
Diary of the Revolution (Serial II)	Editors' Department of Hankow Daily Translated by Zhang Kaiyuan (188)
A List of Alternate Names of Some Figures in the 1911 Revolution	Chen Yutang (203)

论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潮

李 喜 所

一、兴起的原因

辛亥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是由当时特定的国际环境和中国特殊的国情所决定的。

二十世纪初年的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洪峰早已过去，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过渡到了帝国主义阶段。随着垄断组织和金融寡头的出现，大量财富愈来愈集中于少数人手里。在生产飞速发展的背后是人民群众生活的日益贫困。^①资产阶级在发动革命时所描绘的美妙的社会蓝图，在亿万人民群众中间已经破产。人民群众由跟随资产阶级进行革命转变为抨击和反对资本主义制度。^②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兴起的社会主义理论逐步为广大工人群众所接受，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和活动也日益高涨起来。欧美所面临的问题“已经是从资产阶级下面解放出来，即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③这个问题是历史前进中所提出的一个崭新的课题，是时代的号角，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这就为中国人介绍和传播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某种客观因素和可能条件。

然而，中国当时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是对外反对侵略，实现民族独立；对内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制度；在独立、民主的保证下加速发展资本主义，去走欧美各国已经走过了几百年的历史道路。富有政治抱负的中国政治家既不否认中国应重新走欧美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也不愿完全循规蹈矩地去照样走，而是既搞资本主义，又同情社会主义，在发展资本主义近代化工业的同时进行防止造成两极分化的社会革命。因而出现了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奇特的历史现象。不过，这种现象的出现根源于抚育这个阶级成长的土壤之中。

1.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是在外国大资本和封建官僚资本的夹缝中艰难成长起来的，资本家深受大资本凌辱欺压之苦，所以社会主义理论中揭露资本主义竞争所造成的危害对他们有一定的吸引力。

① 例如从1843到1908年，英国工人在国民收入中的所得从45.6%下降到38.1%。1900到1903年期间，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有6—8%的工人失业。（参见《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简史》，三联书店1960年版）

② 例如德国在1900到1909年工人反抗业主规模不等的斗争近2,500次。1900至1905年法国发生罢工斗争1,000次。意大利仅1901年就发生罢工1,042次。1902年春，比利时爆发了三十万人的大罢工。1902年瑞典全国工人总罢工。（同上书）

③ 《列宁选集》第2卷，1972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26页。

2. 民族资本家既惧怕竞争，又幻想国家政权给与保护，天真地盼望在国有的情况下“平均”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所以对于社会主义理论中财产公有的主张也可以部分地接受。

3. 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人常以全民的代表者自居，同时生活上常常每况愈下，他们往往大声疾呼民众的苦难。中国农民在长期的反封建斗争中形成的绝对平均主义的理论武器，他们总是加以借用。而且会把这种绝对平均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人人有饭吃相混淆。这种混淆是他们大力赞美社会主义理论中合乎自己口味的条款的一个原因。

4.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土地问题一直是最尖锐的问题之一。不少有见识的政治家提出“土地国有”的建议，这些东西曾被辛亥革命时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所关注，并把“土地国有”看作解决中国民生问题的关键。他们还错误地认为这就是在搞社会主义。

总之，在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有从他们的角度去宣传社会主义理论的某种可能。尤其在二十世纪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要领导革命，拯救中国，这就迫使他们去如饥似渴地研究当时世界上的各种思想流派。他们并试图吸取各种理论中的精华，以创造一种最美好的理论去指导中国革命，使中国不仅赶上欧美各国，而且超过他们。这促使他们在主要宣传介绍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的同时，也称誉社会主义理论。《浙江潮》有一篇文章中说：“今社会主义之披靡欧美，为雷奔电掣山摧海啸之奇观。”^①《江西》有一篇文章中亦称：“阶级悬远，制度偏侧，贫富贵贱，鸿沟之划厘然，则且有怀抱不平者，发生社会主义，鼓舞一时之穷黎。”^②《复报》也有文章讲道：“近日社会主义，既已轰轰于东西洋，以意料之，二十世纪贫富界之革命，或者比十九世纪之革命而尤剧也，亦未可知。”^③政治上不太激进的《大公报》也赞美社会主义是“思想最高尚之主义”，是“光明奇伟之主义”。^④就是梁启超也充分认识到了社会主义必然兴起的趋势，他总结游美观感时称：

“天下最繁盛者莫如纽约，天下最黑暗者亦莫如纽约。……据社会主义家所统计，美国全国总财产，其十分之七属于彼二十万之富人所有；其十分之三属于此七千九百八十万之贫民所有。故美国之富人则诚富矣，而所谓富族阶级，不过居人口四百分之一。……此等现象，凡各文明国罔不如是，而大都会为尤甚，纽约、伦敦其最著者也。财产分配不均，至于此极。吾观于纽约之贫民窟，而深叹社会主义万不可以已也！……观于此，而知社会之一大革命，其终不免矣。”^⑤

孙中山对欧美社会的研究在同时代人中是最深刻的。他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清醒地看到了“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

^① 《新社会之理论》，《浙江潮》第8期。第6期有一篇《最近之世纪大势变迁史》中也讲“吾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之初，纯乎社会主义之世界矣。”

^② 《国会论》，《江西》第2、3期合刊本。

^③ 《贫富革命》，《复报》第4期。

^④ 《廿世纪之新主义》，《大公报》1903年3月31日。

^⑤ 《新大陆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4—46页。

远。”^① 欧美这种客观现实成了孙中山政治思想形成的重要社会实践。使他产生了既向往资本主义又惧怕资本主义建立时造成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的矛盾心理。从欧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践中产生的这种思想深处的矛盾，反映在他行动上的就是既钦佩欧美的资本主义社会，又赞颂社会主义理论。孙中山十分关心欧美各国的工人运动，曾多次赞美马克思及其学说，并深入研究过《资本论》。1905年他在比利时访问了第二国际书记处，而且自称是中国社会党的代表，“请求接纳他的党为成员”，同时介绍了“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② 孙中山这种认识反映了当时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一种特殊倾向，为辛亥革命时期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主观条件。

但是，仅仅具备客观和主观条件还不足以发生一种社会现象，它还要有偶然因素充当催化剂的作用。一衣带水的日本恰恰起了这方面的作用。蔡元培在1920年就指出：“西洋的社会主义，二十年前，才输入中国。一方面是留日学生从日本间接输入，译有《近世社会主义》等书；一方面是留法学生从法国直接输入的，载在《新世纪》日刊上。”^③ 但二者相比，主要是通过留日学生作媒介。早在1870年前后，社会主义一词已被介绍到了日本。^④ 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日本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很快进入军事帝国主义阶段。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也随之激化，工人的反抗斗争不断增多。从1897到1905年间，工人的罢工斗争达161次，参加人数有两万八千多人。^⑤ 工会也在斗争中涌现，1897年片山潜等成立了工会期成会，随后又出现了东京铁工工会、矫正会、印刷工工会等，日本资本主义所造成的贫富对立已发展为政治上的对抗。诚如福井准造当时就指出的：“我日本今日之形势，社会问题亦隐约于胚胎于其中，贫富悬隔之弊，亦将渐显于社会，是经世忧国之士，所不能漠然置之者也。此所以稽查欧美各国之事例，以讲求近世之社会主义。”^⑥ 二十世纪开始后，日本研究社会主义理论的团体和政党不断增多，如1901年成立的社会主义协会，1902年成立的社会民主党，1903年组成的平民社，1906年创建的日本社会党等。与此同时，马克思的不少著作也译成了日文。1904年11月13日《平民新闻》第53号刊出了幸

① 孙文：《发刊词》，《民报》第1期。

② 《孙中山访问第二国际书记处》，《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

③ 《社会主义史序言》，《新青年》第8卷，第1期。

④ 从目前接触到的资料来看，早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人也注意到了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一些出国人士的游记当中记述了巴黎公社和欧洲工人运动的情况，还把社会主义者（Socialist）译作“平会”。例如1877年随郭嵩焘出使英国、法国的黎庶昌在其《西洋杂志》中记称：“索昔阿利斯脱（Socialist）译言平会也，意谓天之生人，初无歧视，而贫贱者乃胼手胝足，以供富贵人驱使，此极不平之事，而其故实由于国之有君，能富贵人、贫贱人。故结党为会，排日轮值，倘乘隙得逞，不得畏缩，冀尽除各国之君使国无主宰，然后富贵者无所恃，而贫贱者乃得以自伸。……其党甚众，官绅士庶皆有之，散处各国。”此后，上海《万国公报》在1899年第121至123期中连续刊出了由李提摩太译、蔡尔康撰文的题为《大同学》的文章，其中提到欧洲“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又讲：“近世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派，为德国之马克思，主于资本者也。”

⑤ 《日本劳动运动史》，有信堂1966年版，第25页。

⑥ 《近世社会主义》自序，第1页。

德秋水译的《共产党宣言》，接着1905年《社会主义研究》全文译出。1906年《资本论》译成了日文，《社会主义研究》还刊出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此外，《社会》、《大陆周报》、《劳动世界》、《社会杂志》、《东京评论》等刊物也开展了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介绍。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思想界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一股洪流。正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不仅受到了这股思潮的影响，而且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和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交朋友，谈心得体会，并自组了社会主义研究会。日本社会党的集会，也邀请中国留学生参加，景梅九在回忆中讲：“记得有一天，日本社会党在一个梅园里开游园会，约我到那里游去，共有三四十人，集合在那里一个亭子上，团团坐定，几个演说大家，就大发起议论来，激昂得了不得。”¹章太炎甚至还和日本的社会主义者组成了“亚洲和亲会”，主张中日两国革命互相支持。至于留日学生介绍日本研究社会主义的杂志、论文、书籍、集会演说就更司空见惯了。《民报》上经常刊有这方面的文章和广告。1906年北辉次郎著的《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一书虽被日本政府封禁，但仍在中国留学生中广泛流行。这时还有不少社会主义书籍被译成中文，²其中《近世社会主义》一书在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³

总起来讲，如果说欧美兴起的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资产阶级为建立美好社会向西方探求真理的迫切愿望，为辛亥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思潮的突起，提供了客观与主观条件，那么社会主义理论在日本的广泛传播就架起了一道西方社会主义涌向中国的桥梁。通过这座桥梁，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有很多报刊去介绍社会主义学说，请看这里的粗略统计：

辛亥革命时期一些比较集中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

篇 名	出 处
最近之世纪大势变迁史	《浙江潮》第3期。
新社会之理论	《浙江潮》第8期。
廿世纪之新主义	《大公报》1903年3月31日。

¹ 《罪案》第83页。

² 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赵必振译的《社会改良论》、上海少年中国会出版了马君武译的《俄罗斯大风潮》、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赵必振译的《广长舌》；1903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罗大维译的《社会主义》、赵必振译的《近世社会主义》、周子高译的《社会党》、上海作新社出版了岛田三郎所著《社会主义概评》、闻学会出版了高仲译的《社会问题》等。这些书为中国人早期了解社会主义提供了方便和可能。

³ 《近世社会主义》一书共分四编。第一编为“第一期之社会主义”，主要讲空想社会主义在英国和法国兴起的情况；第二编为“第二期之社会主义”，着重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第三编为“近世之社会主义”，中心概述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情况；第四编为“欧美诸国社会党之现状”，叙述了英国、法国、中欧、东欧、美洲等地社会党发展状况。这在当时是比较完整地介绍社会主义发展历史和现状的书籍。

续表一

篇 名	出 处
贫富革命	《复报》第4期。
论社会主义	《政艺通报》第3期。
二十世纪的新主义	《政艺通报》第14、15期。
新大陆游记	该书第44—48页、第111页等。
中国之社会主义	《新民丛报》第46、47、48期合本。
社会主义论	《新民丛报》第89期。
《杂答某报》第5部分	《新民丛报》第86期。
俄罗斯革命之影响	《新民丛报》第62期。
论俄罗斯虚无党	《新民丛报》第40、41期合本。
圣西门之生活及其学说	《新民丛报》第31期。
虚无党	《苏报》1903年6月19日。
露西亚虚无党	《江苏》第4期。
国民新灵魂	《江苏》第5期。
论中国教育之主义	《中国新报》第6期。
论平民主义与国家主义之废兴	《东方杂志》1907年第8期。
社会主义与社会政策	《东方杂志》1911年第12期。
法国社会党之势力	《东方杂志》1912年第2期。
社会主义商兑	《东方杂志》1912年第2期。
德国社会党之胜利	《东方杂志》1912年第12期。
论各国社会党之势力	《东方杂志》1912年第12期。
劳动界之新革命	《东方杂志》1912年第12期。
社会主义	《东方杂志》1912年第12期。
社会主义神髓	《东方杂志》1911年第11期开始连载。
孙中山先生之社会主义讲演录	《东方杂志》1912年第6期。
论工团主义的由来及其作用	《东方杂志》1912年第7期。
社会主义商榷	《民主报》1911年8月13日。

续表二

篇 名	出 处
社会革命大风潮	《天义报》第 2 期，此报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颇多。
驳《时报论今日中国不能提倡共产主义》	《新世纪》第 72 期，此杂志大力介绍社会主义，文章很多。
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	《民报》第 5 期。
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	《民报》第 9 期。
告非难民生主义者	《民报》第 12 期。
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	《民报》第 4 期。
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	《民报》第 5 期。
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	《民报》第 7 期。
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	《民报》第 2 期。
社会主义讲习会广告	《民报》第 15 期。
欧美社会革命运动之种类及评论	《民报》第 4 期。
社会主义史大纲	《民报》第 7 期。

此外象《夏声》、《时报》、《平民报》、《社会公报》、《国风日报》、《社会党月刊》等报刊也有一些文章去介绍社会主义，至于在文章中顺便讲到社会主义问题的就更多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已经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开始出现了。

但是，同认识任何事物一样，人们对一种新的理论的认识也要经过一个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逐步深化的过程。再加上国内和国外政治状况、社会习俗的差异，每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态度、学识水平、兴趣爱好等方面的不同，即使对同一种理论的介绍和研究，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甚至针锋相对的解释。特别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是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派别，科学社会主义者处于少数地位。这种状况使日本的社会主义阵营中也是无政府主义和修正主义理论占上风。依日本的社会主义为主要依据向中国介绍这种理论的人们，当然也受到了这种影响，同时又加上他们自己的理解和发挥，就使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潮中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思想流派，有改良派的社会主义，有革命派的社会主义，有无政府主义派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则不占主导地位。这和工人阶级还处于自在阶段和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思想特点是完全一致的。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社会土壤相辅相成的。

二、改良派的社会主义

资产阶级改良派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介绍和研究早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开始后既多次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①又以精通社会主义理论自诩，甚至斥革命派的社会主义宣传是“吠影吠声”，“未识社会主义之为何物也。”^②然而，综合考察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对社会主义的研究，可以发现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提倡到反对的过程，他们所宣传的社会主义深深打上了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立场来改造加工过的印记。这种社会主义有明显的三个特点。

第一，改良派的社会主义以社会改良主义为归宿。

改良派把社会主义首先看作一种宗教迷信。梁启超在记述游美观感时说：“吾所见社会主义党员，……其于麦克士（德国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之著书，信奉之，如耶苏教人之崇信新旧约然。其汲汲谋所以播殖其主义，亦与彼传教者相类。盖社会主义者，一种之迷信也。”^③从宗教的角度出发，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实基督教平等博爱之教义”，即一为人人自由，“国家不得以威力压迫之”；二为平等，“人对于神为同等之子孙，四海皆同胞也”；三为博爱，普天下“一视同仁”。此三者，“诚得社会主义之神髓矣。”^④这完全把社会主义披上一层神的外衣，变为一种普度众生的推恩行善主义，梁启超进一步概括为：“社会主义，即以救私人之过富过贫为目的者也。”^⑤从这种立场推论，改良派把欧洲的社会主义理论分为两种：一是承认现在之社会组织而加以矫正的社会改良主义派；二是不承认现在之社会组织而加以破坏的社会革命主义派；“两者之最大异点，则以承认现在之经济社会组织与否为界也”。^⑥改良派还把前者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后者叫做极端社会主义。梁启超认为：“极端之社会主义，微特今日之中国不可行，即欧美亦不可行。”^⑦而“国家社会主义，以极专制之组织，行极平等之精神，于中国历史上性质，颇有奇异之契合也。……若中国有人，则办此真较易于欧美。”^⑧“吾所绝对赞成者，即所谓社会改良主义是也”。^⑨梁启超多次告诫中国当政者在制订大政方针时，要采用“社会改良派所发明的种种政策”。^⑩在这种思想认识指导下，改良派在宣传社会主义理论时不仅大力介绍欧洲社会改良派的政治主张，而且歌颂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所作所为。梁启超称赞圣西门在美国的试验开创了“新天地”，他在

^① 1902年《新民丛报》第18期刊出了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的文章，称“麦喀士，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此后在《新民丛报》第42、43期的合本中又发表了一篇《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间接地介绍了马克思资本论的观点，并提到：“麦喀士，社会主义之鼻祖，德国人，著书甚多。”

^② 《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86期。

^③ 《新大陆游记》第48页。

^④ 《论中国教育之主义》，《中国新报》第6期。

^⑤ 《再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新民丛报》第92期。

^⑥ 《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86期。

^{⑦⑧} 《新大陆游记》第47—48页。

^⑨ 《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86期。

^⑩ 《再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新民丛报》第92期。

1903年游美时千方百计要到那里考察。《新民丛报》第31期还专门刊出了一篇《圣西门之生活及其学说》的文章，较详细地介绍了圣西门和傅立叶的生平、活动和政治主张，并对他们的贡献给与充分的肯定。为了把社会主义的主流归之为社会改良主义，《新民丛报》还登过一篇《社会主义论》的长文，梁启超在按语中称其目的为弄通“社会主义为何物。”此文首先摆开学术研究的架势，考察了社会主义一词的来历和欧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几个阶段，^①接着介绍当时流行的几个社会主义派别。文章把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归之为狭义的社会主义，并不赞赏。但把社会改良主义称为广义的社会主义，具体又分作国家社会主义，“谋假国家之力以达其矫正之手段者属之”；自助的社会主义，“不假国家之力，劳动者自相团结，以谋达其矫正之手段者属之”；慈惠的社会主义，“社会上之慈善家，谋专以慈善事业普济社会者属之。”^②作者对这几种社会主义津津乐道地加以描绘，寄希望于中国实行。梁启超选择这样的文章刊登于他主编的《新民丛报》，显然是因为和他提倡的社会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十分合拍。

值得研究的是，梁启超等改良派既然赞同的并非真正的社会主义，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扯起社会主义大旗呢？

考其原因有二：一是社会主义者所揭露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尖锐问题引起了改良派的关注，他们感到社会革命迟早要在世界上发生。^③早在1903年梁启超就断言：“社会主义为今日全世界最大问题。”^④此后他又明确指出：“今日世界各国之最苦于解决者，尤莫如其中之分配问题，坐是之故，而有谓社会主义者兴，社会主义虽不敢谓世界唯一之大问题，要之为世界最大问题中之一而占极重要之位置也。”^⑤资产阶级改良派在二十世纪初年主张改革这一根本立场并未改变，改革的前提是要看到社会的弊病，社会主义理论中斥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尖锐必将引起火山爆发的预言，正好可以被改良派用来恐吓中国的当权者，更可以作为他们推行改良主张的又一理论根据。所以，《新民丛报》可以登《社会党》、《近世社会主义》等书的广告，梁启超可以撰文去阐述俄国虚无党的社会主义主张。

二是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社会改良主义的某些政治主张在梁启超等人看来与他们有相近之处。马克思对自由竞争和垄断的分析，梁启超是深为赞同的，所以他讲：“社会主义之

① 据该文所述社会主义一词的来历为：“社会主义，英文谓之 Socialism，德文谓之 Socialismus，法文谓之 Socialisme，西班牙及葡萄牙文谓之 Socialismo，而此数语之由来，则皆渊之于拉丁语Socius之形容词 Socialis。盖与东译之社会主义之名词无以异也。播此语于一般社会者，法人 Reyband也，彼于1840年（亦作1839年）著一书，公诸世，名曰‘Etudes Sur les Reformateurs On Socialistes Modernes’，书中论及欧人 Own、法人 St. Simon Eourier 等社会改革者之学说，而字其说曰社会主义，其意犹言此学说之性质谓之为谋政治上之改革，毋宁谓之为谋社会上之改革之为当也。自此以后，社会主义四字之名词，遂见著于世界。”（见《新民丛报》第89期）

② 《社会主义论》，《新民丛报》第89期。

③ 《平等说与中国伦理之冲突》，《新民丛报》第70期刊出的《平等说与中国伦理之冲突》的文章中讲：“泰西今日伏有不平等褐机一，贫富是也。……此后之导火线，惟劳动人之对于资本家而已。”

④ 《新大陆游记》第48页。

⑤ 《社会主义论》一文按语，《新民丛报》第89期。

目的，在救自由竞争之弊而已。”^①社会主义所指出的贫富两极分化，改良派也完全承认，认为“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之者也”。^②至于以改良为主要内容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派别，更和梁启超等人有共同语言。甚至俾斯麦所倡导的反动的国家社会主义，梁启超也大力称赞。古往今来的思想发展史表明，理论一旦迎合了某个政治集团的政治企图，它就会被这个集团所大力鼓吹。梁启超等人认为欧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有合乎自己口味的东西，他们当然要大讲社会主义。

但是，他们宣传社会主义还有一个极为特殊的原因，就是为了反对革命派在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鼓吹的社会革命，这就构成了改良派社会主义的第二个特点：即和反对进行社会革命结合在一起。

1905年前后，出于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需要，革命派掀起了宣传社会主义的高潮。他们宣传的中心是在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国的同时进行防止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后造成两极分化的社会革命，也就是平均地权，土地国有。不料，革命派的这个主张不仅遭到了改良派的反对，而且使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发生了变化。1903年前后，尽管梁启超赞同的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但并不持反对态度；1905年前后，尽管他仍在高唱社会主义，但实际上站到了社会主义的对立面。诚如革命党人所揭露的那样：“梁氏于彼报去年（1906）第三号以前，既极力绍介社会主义学说于中国，而其第三号以民报言社会主义也，则曰‘此主义在欧洲社会常足以煽下流’。”^③梁启超这种转折是出于驳倒革命派倡导的“社会革命论”的需要，综合他提出的理由，不外乎三点。

1. 革命派宣传的是假社会主义。梁启超用釜底抽薪的办法，从根本上否认革命派宣传的是社会主义。他认为革命派要发动革命、平均地权，这是用野蛮之力杀掉中国人之半，不但不合于人道，“即社会主义先辈，亦不闻有此学说！麦喀（马克思）谓田主及资本家皆盗也，今以此手段取之，则国家其毋乃先盗矣乎？！”^④梁启超指出，实现社会主义，并不是“由人民暴动举行社会革命”，而要用“开明专制及政治革命后之立法事业，当参以国家社会主义的精神，以豫销将来社会革命之祸”，这才叫“高尚纯洁之主义”。^⑤他攻击革命派是把哲理的社会主义和“感情的社会革命”混在了一起。所以拿他们的社会主义去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社会改良派及社会革命派相比较，“谓其属甲派而不类，谓其属乙派而又不类”，无非是“盗取其主义之一节为旗帜，冀以欺天下之无识者”。^⑥

2. 中国不存在欧洲社会革命的社会基础。改良派认为，欧洲社会主义的兴起，“全由现今社会组织不完善而来。我国现今经济社会之组织，虽未可云完善，然以比诸工业革命前之欧洲，则固优于彼。故今后生产问题，虽有进化，而分配问题，仍可彼此进化之轨而

① 《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86期。

② 《中国之社会主义》，《新民丛报》第46、47、48期合本。

③ 《告非难民生主义者》，《民报》第12期。

④ 《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第76期。

⑤ 《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本报之驳论》，《新民丛报》第79期。

⑥ 《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86期。

行”。如果说欧洲现在主要问题是由于分配不均而引起的社会主义运动，那么“今日中国所当急研究者，乃生产问题”。梁启超指出，中国既不必进行英国那样的工业革命，更不要发动目前欧洲社会主义者倡导的“社会革命”。这是因为“欧美人之倡社会革命，乃立于时势不得不然，……今吾中国情形与彼立于反正之地位，闻其一二学说乃而吠影吠声以随逐之，虽崇拜欧风，亦何必至于此极耶！”这恰似“病异症而妄尝人药，则自厌其寿耳”。^①

3. 提倡社会革命有碍资本主义发展。梁启超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以分配之均为期，质言之，则抑资本家之专横，谋劳动者之利益也。此在欧美，诚医群之圣药，而施诸今日之中国，恐利不足以偿其病也”。原因是“中国是国际资本主义竞争的大市场，能与外国竞争者，唯有中国资本家。但目前中国资本家‘微微不振，星星不团，不能从事于大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再提倡社会主义革命，号召‘排斥资本家’，‘煽惑劳动者以减少时间，要求增加佣率，否则同盟罢工挟之’，使资本家无法发展生产，‘不复能与他国之同业竞，而因以倒闭’。其他资本家则见而生危，‘坐听外国资本势力骎骎然淹没于我全国之市场’。长此而往，国亡在即。革命派提倡社会革命，‘其亡国之罪，真上通于天矣！’”^②

综合来看，梁启超的社会主义是以社会改革来代替社会革命，从这个总则出发才找出了批驳革命派社会主义的几种理由。很显然，这些理由还是改良派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老调重弹，唯一不同的是贴上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标签。

第三，改良派社会主义的性质是保守的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评判一种社会理论的性质，在主要考察其政纲的同时，还不能忽略其实施方法。梁启超等改良派社会主义的纲领是社会改良主义，他们实施的办法又是什么呢？

梁启超的回答是：“以奖励资本家为第一义，而以保护劳动者为第二义。”具体做法是在不改变现在社会组织的前提下，作如下改革：

1. 铁道、市街、电车、电灯、自来水等归之公有，不被少数人所垄断。
2. 制订各种产业组合法，让小资本者和无资本者都可以发展生产。
3. 制订工场条例，使资本家不能虐待工人，同时要有明文保护妇女、儿童。
4. 设置各种储蓄机关，以保证中小资本家有资金可用。
5. 以累进税率行所得税和遗产税，限制巨富者出现，为公共福利事业积累资金。

“此种社会主义，即所谓社会改良主义也。”^③

改良派同时也主张实行社会主义式的“资本国有”，他们认为：“为防托辣斯兼并之势，则国有为优；为调剂劳动问题之穷，则亦国有为优。故国有政策，自今以往，日益占势力矣。而社会主义家言，且并倡资本归公之说，此其义在今日中国，固万难实行，然此实世界之公理，将来必至之符。”^④改良派在这里虽然不提倡马上实行，但对资本归公还是推崇备至的。不过他们实现的方法仍然不是革命，其称：“近世社会主义者，专从事事实上着眼，

^① 以上引文参见《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86期。

^② 以上参见《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86期。

^③ 参见《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86期。

^④ 《外资输入问题》，《新民丛报》第56期。

从破坏现在社会之外部组织为目的。……吾之主义，以促社会之进化为目的，故弗取焉。”^①而且他们相信，只要这样循序渐进地逐步改良，“社会主义家所希望之黄金世界，虽未可期，而现在欧美社会阴风惨雨之气象，其亦可以免矣。”^②

马克思在论述保守的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时指出：“社会主义的资产者愿意要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是不要由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愿意要现存的社会，但是不要那些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解体的因素。”又说：“这种社会主义所理解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绝对不是只有通过革命的途径才能实现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消灭，而是一些行政上的改良，这些改良是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实行的，因而丝毫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至多只能减少资产阶级的统治费用和简化它的国家行政事务。”^③将梁启超等改良派揭出的社会主义政纲和他们发布的实施办法综合加以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倡导的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在这里深刻论述的欧洲那种保守的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将这种社会主义搬到处于革命大变动中的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是没有多大进步意义的。唯一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为中国人早期了解社会主义提供了必要的思想资料。

三、革命派的社会主义

资产阶级革命派对社会主义的宣传介绍，从人数到规模上都大大超过了梁启超等改良派。拿《民报》和《新民丛报》相比，在对社会主义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民报》总是略胜一筹。但革命派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是十分庞杂的，除了分出一个明显的无政府主义派之外（这个派别的社会主义我们放在后面讨论），还有各种各样的派别和主义。宋教仁在主办《民立报》时曾作过综合分析，但并非全面。从目前所能接触到的资料来看，革命派在介绍和理解欧洲社会主义理论中有五种不同的说法。

1. 民生主义式的社会主义。

在孙中山等人看来，民生主义就是依据中国的社会实际和借鉴欧洲的社会经济而概括总结出来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我们常常发现他们在论述这一问题时交替使用社会主义和民生主义两种词汇。有的革命党人索性把民生主义和英文中的 Socialism（社会主义）等同起来。^④景梅九在回忆当时留日青年学生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时说：“这主义就是三民主义里边的民生主义，与同盟会不相违背，所以和日本社会党握起手来，天天在一块谈世界革命大势。”^⑤革命派这种社会主义的宗旨是救“贫富不均”，预防“社会革命”。具体采取的办法一为限制大资本，“托辣斯（Trust）于民生主义为绝对的反对”；一为平均地权，以除“地主之为害于社会”。他们还认为这种社会主义是数千年前本来就有的东西，如三代之井田，汉代之王莽新制，宋朝之王安石变法，就是太平天国的“公仓亦民生主义之一端也”。^⑥

① 《论中国教育之主义》，《中国新报》第 6 期。

② 《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 86 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80、281 页。

④ 参见《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民报》第 4 期。

⑤ 《罪案》第 73 页。

⑥ 参见《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民报》第 4 期。